

上帝的「中國異象」與屬靈民族主義

靈恩基督教內置的強烈情感動力與民族主義運動中的大眾情感表達，具有相近的自發性與草根性。儘管兩者的思想內核並不一致，但這一情感面向的草根宗教表達不僅可以助燃民族主義，同時也使中國基督徒的民族主義行動較世俗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 (state nationalism) 更易獲得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認可。這在歷史上和當今時代似乎都是如此。

一、基督教中國化中的民族主義意識

清末民初，面臨救亡圖存的歷史關頭，部分中國近代精英在傳教士的影響與鼓動下，發展出這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將中國建設成為比肩西方列強的現代國家的觀念，並將基督教當作振興民族靈魂的唯一希望以及獲得西方支持的籌碼。¹ 這或許是民族主義自強夢想與基督教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交匯。

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傳教士與燕京大學首任校長司徒雷登 (John L. Stuart) 在 1925 年五卅運動後發表的題為〈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的文章中指出：「隨著目前中國人民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他們理所當然地

要反對任何削弱其追隨者愛國熱情的組織和信念。為了使我下面要講的話不至於被誤解，我首先表明我的立場和中國人民要求修改外國條約的立場是一致的，即一切不平等現象都應該被改正——一切不公正的權益都應該被取消。我承認這些要求是公正合理的，我也確信那些對此問題採取積極友好承認態度的國家和中國一樣，從中取得真正的利益。不僅如此，我還認為現在支配著中國人民思想的民族主義感情，正是這個國家有希望的現象。」² 以司徒雷登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傳教士在20世紀初風起雲湧的反帝運動中選擇站在中國一邊，同情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並將基督教與民族主義的關係作積極闡釋，以促使教會「中華民族化」。³ 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民族主義與民族覺醒在早期基督教中國化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可以說它催生了20世紀初基督教在華發展的「黃金時代」，體現了從西方差會向本土中國教會的過渡性。⁴ 在21世紀初，經歷了半個世紀巨大的社會變遷，並隨著中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劇，一種新型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意識使基督教的中國化上升到一個新的平台。

受強調競爭意識與適者生存的市場經濟文化影響，沿海地區的中國教會已被新興商人群體注入了企業家的競爭和創新精神，溫州的獨立教會領袖更看到了躍升更大國際宗教舞台的機遇。對他們來說，這種國際躍升並非要以否定中國自身的世俗主義政治傳統（包括激進的社會主義歷史）為前提，而是如何更積極地看待和利用歷史上國族建設留下的獨特政治話語、社會記憶與大眾情感，並以此為基礎彰顯其屬靈能量與意義。換句話說，老闆基督徒作為在溫州獨立教會發展過程中起帶頭作用的新興基督教商人群體，不僅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植入了自己的文化邏輯，也為中國仍在進行的國族建設運動帶來嶄新的宗教靈性元素。本章即以他們的話語為分析對象，探討當代中國基督教內部的屬靈復興（spiritual renewal）如何和地方上自發的草根民族主義情感（popular nationalism）交匯。在嶄新的商業世界所取得的成功，激勵著這些男性精英基督徒在教會中

找尋靈性上的聲望與構築屬於本群體的精神高地。為此，他們為自身在改革開放中所取得的經濟成就編織了一套屬靈敘事 (spiritual narrative)，並向教內外傳播一個被其稱作「中國異象」的新願景。他們積極響應國家現代性的民族主義話語，深信中國不僅會在經濟領域騰飛，也會在精神靈性領域崛起，還將由一個接受宣教的國家轉型成一個對外宣教的國家。

改革時期的基督教發展，與民族記憶及民族主義想像有著密切聯繫，而這一基督教發展恰與黨和國家對世俗民族主義 (secular nationalism) 的推崇相左。中國當代的世俗民族主義其實是民國時期國民黨政權的遺產。美國歷史學者張倩雯 (Rebecca Medostup) 對國民黨在南京十年時期 (1927-1937) 的世俗化方針和國家建設的努力進行了細緻的歷史考察，指出世俗民族主義的困境在於否定了宗教在建設中國現代文明和現代化進程中的角色，並借助強力抑制與宗教符號及儀式緊密結合的民間團體的自發情感表達，使得民族主義淪為空洞和流於形式的政治動員話語。⁵ 這一世俗民族主義至今仍影響著中國宗教的發展走向與地方社會的秩序。浙江「三改一拆」風波中，大量的教堂十字架被拆除這一事實即反映了新時期國家消滅神聖權威和重塑地方秩序的企圖。不過，儘管近代以來國家一直將現代化與世俗化並舉，但也並未完全壟斷現代民族主義話語。後者已成為地方宗教團體的自發情感表達渠道以及合法性的來源。

自20世紀50年代早期外國傳教士遭新中國政權驅逐以來，基督教的人事組織架構實現了本土化。但是，由於缺乏主導性的解釋性權威，中國本土基督教呈現出混雜且碎片化的特徵。⁶ 如前所述，靈恩影響下的城市基督教復興與改革時代中國現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興起的草根民族主義情緒之間，具有某種相互勾連的關係。筆者使用「屬靈民族主義」一詞來刻畫這樣一個多層次的進程：處於優勢地位的中國城市基督徒將民族國家的規範內化，把自己塑造成同國族建設規劃相符合的現代宗教主體，並在基層草根社會適應並推動了

民族主義的振興。⁷ 屬靈民族主義隱含在中國沿海一些精英商人基督徒的行為實踐之中。20世紀初，許多早期的革命派和城市裡的專業人士深受西方傳教士影響，並冀望借用西方新教的民族主義概念來將中國建設為現代民族國家。其時，將中國建設成為基督教共和國的觀念頗受這一群體的歡迎。當代中國精英基督徒的屬靈民族主義也恰恰呼應了這種國家觀念。⁸ 當然，這並不說明基督教與中國的精英民族主義之間有著內在關聯，而是表明基督徒的民族主義話語凸顯了當代中國一種精英式的信仰形式。除此之外，本章還將說明，國家主導的民族主義敘事並非佔據了絕對壟斷的霸權地位，它還為另一種草根版本的民族主義的興起提供了話語空間，後者與邊陲沿海地區的地域認同和宗教認同並不衝突。

二、商人精英的傳教激情與改革成就的屬靈解讀

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會（尤其是天主教會）主要由西方差會所掌控，但在溫州，六個基督新教宗派（或宣教團體）中有一半都是由當地華人基督教領袖獨立於外國差會而建立的。⁹ 1949年之前的溫州教會運動強調本土基督教領導權和教會本土化，而現今的溫州由企業家主導基督教發展，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對前者的繼承。自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進行經濟改革後，溫州的企業家基督徒在產銷中迅速發家致富。致富後，他們與教內團體的聯繫更加緊密了，因為他們堅信，自己取得商業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家鄉溫州的基督教傳統，是他們家庭的基督教背景使他們獲得了上帝的庇佑。這種超自然因果關係的普遍觀念使得許多原本並不那麼虔誠的企業家基督徒到聖經中尋求意義，進而點燃了他們傳播福音的熱情。通過「回饋神的恩典」這樣的流行說辭，當地教會領袖甚至能從過去不怎麼熱忱的商人基督徒身上調用資源、獲得支持，以大力開展各種教會工